

統計與政治

沃林教授著

財政經濟出版社

3240

書號 0 3 7 6
定價 五 角 八 分

統 計 與 政 治

沃 林 敦 授 著

岳 漁 譯

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說明統計與政治的關係，指出統計應為政治服務。

全書分章闡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統計所賦予的含義，並引證他們在其經典著作中應用統計的方法，同時批判了資產階級以及‘左’右各派對統計的不正確觀點，最後介紹了由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發點的從事統計的正確路線。

書中列舉許多鮮明事實作為統計的範例，使讀者清楚地了解到統計技術應如何與政治結合，使統計的功能提高到新的一步。

分類：財政經濟

編號：0376

統 計 與 政 治

定價(7) 五角八分

譯 者：岳 漁

原書名 Статист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原作者 Б. М. Волин

原出版處 蘇聯國立統計出版社

原出版年份 1952年

出版者：財 政 經 濟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七號

印刷者：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55.6. 京製，65頁，91千字；287×1092，1/25開，5—1/5印張
1955年6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對)1—6,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零八號)

社會經濟統計是

認識社會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 列 寧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研究社會發展規律的關鍵，應到經濟中去探求。

斯大林同志指示：“…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黨在製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時，首先應以生產發展底規律、應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①。列寧教導我們：“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在列寧直接領導下舉行的聯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把這個原理更進一步地發展了，當時所記錄下來的是這樣：“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和經濟的概括與完成”^②。

由此可見，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國家的政治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成熟了的物質要求的集中表現，它是蘇維埃制度的生存基礎。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依據所認識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實現了國家經濟生活的有計劃的領導。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不僅是客觀可能性的反映，而且也是蘇聯人——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的活動的核算。

列寧還在自己偉大活動的初期（包括本世紀以前的第一篇論文“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一八九三年）即告誡我們，沒有對經濟過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八六三頁。

② “聯共（布）歷屆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體會議的決議案與決議”，第六版，第一部，第三三八頁。

程之完備與確切的說明，就談不到關於任何實際辦法的指示。而在具體的經濟方面以及文化問題和很多其他的問題上，沒有統計是不能了解的。統計所從事的工作，就是研究各種資料，即研究指明國民經濟發展之特點的、為通曉個別企業經濟所需要的、為研究整個國民經濟所需要的種種資料。一九二一年列寧在“論統一經濟計劃”那篇論文上寫道：“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決不會從事編製無謂的提綱，而是去細心研究事實、數目字、及實際材料，詳細分析我們自己的實際工作經驗，而公開說明：我們在某某地方犯了錯誤，要用某種某種方法加以改正”^①。

列寧和斯大林曾再三強調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統計的重要意義。列寧指示：“統計和監督就是為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②。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四年說到統計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時曾說明：“任何建設工作、任何國家工作、任何計劃工作如果沒有正確的核算，那是不能想像的。但核算如果沒有統計，也是不能想像的。核算如果離開統計，則一步也不能夠前進”^③。沒有核算，就不可能實現經濟核算和確定企業的贏餘，不可能考查生產的經濟情況、決定現有的後備力量、在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降低產品成本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中央統計局所公佈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完成的總結以及蘇聯中央統計局關於國民計劃完成的每年總結與每季總結的公佈，就是核算和監督制度發展的結果之一。

統計供給關於我國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材料，關於現有物質的材料，關於新技術發展和已完成的經濟技術定額的材料。它幫助監督完成計劃，幫助發掘由改進運用生產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省原料燃料的消耗等等方法而獲得的新的後備力量。

① 列寧：“論統一經濟計劃”，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十一頁。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卷，第二四八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一四頁。

列寧曾經指示，統計必須是吸收羣衆到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來的積極工具。必須是表明先進經驗之優良榜樣的工具。列寧說到組織競賽是“巨大而困難的工作，同時又是富有結果的工作”時，特別講到個別榜樣的意義。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別榜樣底意義…必然是極其有限的；祇有滿懷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人，才能夠夢想以慈善機關榜樣的影響來‘糾正’資本主義”。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列寧指示，在這裏“榜樣底力量，第一次有可能來表現自己的廣大影響”^①。

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的初稿中寫道：“榜樣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決不能表現自己，但一到取消了土地和工廠私有制的社會中就獲得了巨大的意義。這不僅因為在這裏將要（也許）做效優良榜樣，而且也因為隨着生產組織的優良榜樣的出現，將必然使勞動減輕和使實現這種優良組織的人們的消費總額增加”^②。

列寧指出了蘇維埃統計的特點。蘇維埃統計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統計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統計純粹是“公務人”或本行專家底事務，而蘇維埃統計則應當把它灌輸“到羣衆中去，把它通俗化，使勞動羣衆逐漸地學會親自瞭解並看到應該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樣休息、休息多久，使各個公社間經濟成績底比較，成為大家注意和研究底對象，使優良的公社立即得到獎賞…”^③。

列寧教導我們，統計所應當提供的，不是單純的數字羅列，而是對已經完全顯現或正在顯現的被研究現象的各種社會類型作科學的數字說明。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出發的，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的觀點上看來，重要的東西，首先就是正在產生和正在發展的東西。

列寧曾預告我們必須反對在統計方面之狹隘的統計見解。他質問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卷，第三九一頁。

②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七九頁。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卷，第三九一頁。

一個作家時寫道：“有時候是否因為數字系列的緣故而忽視了類型、忽視了農戶的社會經濟類型（強大的有產者業主；中等業主；半無產者；無產者）呢？由於統計材料的特性，這個危險是非常之大的。‘數字系列’足以誘惑人”。列寧注意到‘講壇社會主義者們’、馬克思的‘批評家們’，即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自由派、民粹派都是以自己的‘方針’“這樣來摧殘資料之生動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的。他們要把階級鬥爭淹沒在一系列又一系列的數字之中”^①。

列寧堅決地預告我們必須反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見數字的堆積看不見現象之經濟類型的“統計白癡病”，反對統計的墨守陳規“統計的迷戀”，反對“統計癖”、“缺少政治經濟的理性、理解”。

在這方面，列寧在其“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所作的指示，是有巨大的科學——政治意義的。列寧說到關於工廠的科學概念與“工廠統計”的意義時，和揭發民粹派尼古拉一類人對這問題的錯誤以及米海洛夫斯基的錯誤時，就警告過，說不能把屬於社會經濟範疇的大工業的發展問題僅僅歸結到工廠統計。列寧指示：因為這不僅是統計問題，而是“某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所經過的形式與階段”^②問題。同時列寧就作出了對統計的極端重要的結論。他認為只有把社會——政治形式的實質及其特點闡明之後，“那末以適當整理的統計材料來例證某些形式底發展，這才有意思”^③。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關於把當時出版的“經濟生活”報改為勞動國防會議的機關報的一封信中，曾要求必須把在報上發表的統計材料加以分析、加以科學的整理，“以便得出為管理工業等等所需的正確結論”。列寧指示：“所有登載的統計材料，必須極其精確，即必須更注意地、更細密地分類，要隨時求得可供比較的材料，要隨時引證過去年

①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十五頁。

②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二頁。

③ 同上。

度(月份以及諸如此類)的材料,要隨時選擇可供分析、可供說明成績不良的原因的材料、可供標出某些有成績的企業或只優於其他企業的企業的材料”^①。

列寧和斯大林經常地警誡我們,必須反對抽取個別的事實、反對以個別事例來“強制”證明某種偏執思想的手法。列寧在其“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法則的新資料”的名著中指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的主要錯誤之一,就在於他們割斷了個別的大小事實、個別的大小數字與政治經濟方面的總的聯繫”^②。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觀察現象、事實,必須在它們的總和中、在它們的相互聯系中去觀察,同時這些現象、事實,必須是確鑿的和無可爭辯的。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或許可以保證對社會現象的真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列寧在“統計學與社會學”那部惜未完成的著作中寫道:“必須力求從確鑿與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建立一足為依據的基礎,以便可以把這一基礎去同目前在某些國家裏面肆行濫用的任何一種‘普遍性的’、‘典型的’判斷進行比較。為使它實際上是基礎起見,就必須不去抽取個別的事實,而採取與我們所觀察的問題有關聯的各種事實的整個總和(毫無例外),因為如果不是這樣,便不可避免地要產生一種懷疑、一種完全應有的懷疑,即是會懷疑各種事實是任意挑選或收集的,會懷疑或者是為了辯護卑鄙的勾當而以‘主觀的’捏造來代替整個歷史現象的客觀聯繫和相互關係……”

根據這種種的設想,所以我們決定從統計工作方面着手……”^③。

列寧和斯大林要求我們去分析與某一問題有關聯的各種事實的整個總和。統計是可以滿足這種要求的,因為統計所研究的不是孤立的社會經濟的現象和事實,而是它們的整體、它們的聯繫和相互關係。

① “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九卷,第四六〇至四六一頁。

② 同上,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七頁。

③ 同上,第二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列寧不只一次地強調指出：統計資料的綜合必須是有理性的，不能容許數字計算的堆積。數字計算的堆積，徒然把現象的一般情況弄得模糊不清而已，“結果是迷戀於爲統計而統計、玩弄數字，以致損害了情況的明確性和於研究有用的材料”^①。

此外，列寧曾力求達到資料的科學整理。他指示“必須使資料整理結果所得的答覆是確鑿的、客觀的、根據大量資料之計算的，是能答覆俄國改革後的經濟學由半個世紀多的分析而指出或擬定之一切問題……的”^②。

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列寧曾強調必須引用被精細整理和分析過的統計資料並從這些資料中作出實際的結論。一九二一年五月列寧寫給克爾日昌諾夫斯基的信上說：“統計應當是我們的實際助手，而不是煩瑣哲學”^③。

斯大林同志指出統計一切環節的相互依存性時，特別強調需要科學的、實在的統計。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說：“統計工作是這樣一種工作，即一個整體的各個部門，是互相連接的環節，因此，如果有一個環節遭到損壞，那末整個工作就有被損壞的危險”^④。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中曾要中央統計局提供“不受任何成見影響的客觀材料，因為勉強使數字適應於某種成見的企圖，乃是一種刑事罪”^⑤。

關於統計和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何的巨大，人民公敵偽造和顛倒數字材料與事實時是如何地設法進行危害勾當，這些問題莫洛托夫同志早在其一九二七年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中，就已經講過了。

①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二三九頁。

② 同上，第二十卷，第六七頁。

③ 同上，第三十五卷，第四二四頁。

④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一四至二一五頁。

⑤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一頁。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前不久的時候,中央統計局出版了一本統計彙刊,其中有一個統計表上,包含關於蘇聯農民在蘇維埃政權的十年期內所增加的使用土地、總共只百分之三十一的材料,而實際上當時農民所得到手的過去的地主、貴族和寺院的土地,則在一億五千萬公頃以上。

大家知道:列寧在“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土地問題”一文中曾經指出農村的土地分配是按革命以前的三個主要類別來分配的,這三個主要的類別便是:大多數被農奴制剝削的破產農民,中農和農業資產階級、即富農。中央統計局的偽造家們製造革命以後時期的資料,是按下列三個類別來製造的,即按:農民,國有土地,最後是城市、機關和企業。在“農民”一欄中所載的,既有富農,又有中農,也有貧農。莫洛托夫同志揭發“土地改革對照表”是中央統計局統計學家的極其有害的作品時,就指明在那本彙刊中沒有任何階級的、即科學的分類。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央統計局沒有完成統計科學的最起碼的要求,其所整理出來的資料是別有用心的,由中央統計局關於“土地改革對照表”的那種統計表,便可以看出其目的是在反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與此相反,莫洛托夫同志引用了說明農村社會發展過程的下列統計表^①:

一九二四—五年度、一九二五—六年度、一九二六—七年度
按社會經濟類別的蘇聯人口數量與人口分配表

人 口 類 別	獨自經營的農戶人口 或戶數 (千為單位)			對農業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1924—25 年 度	1925—26 年 度	1926—27 年 度	1924—25 年 度	1925—26 年 度	1926—27 年 度
農業的.....	—	—	—	100	100	100
一、無產階級.....	2,700.0	3,000.0	3,200.0	4.4	5.0	5.3
二、不僱用日工的	19,059.0	18,470.0	18,473.0	88.7	87.4	86.8
1.貧農類.....	6,070.0	5,441.0	5,212.0	24.0	21.6	20.4
2.中農類.....	12,989.0	13,029.0	13,261.0	64.7	65.8	66.4
三、僱用日工的...	1,234.0	1,327.0	1,404.0	6.9	7.6	7.9

① 參閱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版,第一〇五四頁。

從上表可以明顯地看出在農村裏面中農類別的比重是一年一年地增加（百分之六十四點七，百分之六十五點八，百分之六十六點四），貧農類別是年年減少的（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二十一點六，百分之二十點四）。這是土地國有的顯著而真實的成果，亦即一切土地革命的最迫切、最基本事業的成果，它給了中農和貧農一億五千萬公頃的新土地。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決議案的最重要原則之一，就是以莫洛托夫同志所引用的這個統計表的資料為基礎的。決議案上說：“正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的特殊條件，貧農進到中農類別的可能性日益增長。由此可見我們農村分化過程的特點，是中農階層的繼續增加，也再一次地證實了列寧同志所說的中農是‘農業的中心人物’這一著名的原則”^①。

經過兩年之後，一九二九年九月莫洛托夫同志在其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一次代表會議所作的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報告中，揭發和粉碎右傾分子時，又重新講到了統計與政治的問題。

莫洛托夫同志斷言由於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鬥爭的尖銳化的結果，暗中傳播敵視蘇維埃國家利益的政治傾向的企圖就越來越多了。這些企圖表現在富農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蘇維埃機關各軟弱環節上的壓力。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這種壓力甚至於在像我國統計這樣的部門中，也有了影響”^②。

政府需要決定國家採購糧食方面的計劃。但為了這一目的而計算農村經濟的各個因素，特別是它們的穀物部分時，就必須有如莫洛托夫同志所指出的、確定的、科學的統計根據。可是“適當的統計工作在很多場合中進行的情形，實際上是往往以遷就這些工作者的資產階級——富農的政治結論的似乎‘無偏無頗的’數字”^③來代替了真正的科

①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版，第一三〇七頁。

② “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矛盾的增長”，一九二九年，第五九頁。

③ 同上。

學的客觀的統計。

倘若蘇聯政府無批判地對待反映資產階級——富農政策利益的類似的統計結論，則結果是什麼呢？很顯然，不僅不能擴大採購糧食的計劃，相反，還必須把這個計劃縮到小於頭一年的計劃。

莫洛托夫同志接着說：“幸而我們有同在一切表現中的資產階級影響鬥爭的布爾什維克的經驗，以及採購糧食工作本身大體上的勝利進程，使我們有可能把因適合資產階級政策而假造出來數字拋到一邊去了”^①。

人民公敵在統計科學部門中不僅假造了，顛倒了數字，而且還企圖奠定其幹破壞勾當的“科學”基礎，企圖取消作為科學的統計學。

共產主義社會的任何一個積極建設者的任務，在善於從數字資料的後面看到生動的實際，有創造性地理解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種趨勢，去理解由最初不大的、不易看出的、逐漸的量變、過渡到新質狀態的各種可能。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的著作，在了解作為有其一定特殊任務的社會科學之一的社會經濟統計的本質方面，可以得到最豐富的材料。

① “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矛盾的增長”，一九二九年，第六十頁。

二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科學的、客觀的統計，具有最重要的意義，是認識社會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照列寧的說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研究社會現象方面牢不可破的客觀性的最卓越的範例”之一。馬克思講到創作他的“資本論”時期的時候，曾經說：“當我的健康不良時，我不能寫下去，但我却翻閱了大量的統計上的和其他的‘材料’……”^①。恩格斯說到“資本論”第一卷時，指出它“……包含着科學的研究和實驗的材料”……，說“資本論”的作者“……在任何地方都不使事實來遷就自己的理論，相反，總是力求把自己的理論當作事實的結果提交出來。這些事實他向來是從可靠的來源方面採用的，至關於最近時期的材料，也是有確實出處的……”^②。關於恩格斯的著作，如充滿了經過精密審查，科學整理之統計材料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住宅問題”以及恩格斯的其他各種著作，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馬克思全面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時曾廣泛地使用統計。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面曾扼要地說明統計的主要原則，即是對於每一種社會現象，在說明其社會經濟關係之後，在說明一定類型、時代和發生作用的地點之社會現象的本質以後，是可以統計去研究的：

“只有瞭解在利潤率形成中起作用的各種關係以後，統計才有可能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五一六頁。

② 同上，第十八卷上冊，第二二四頁。

應用到各時代和各國家的工資率的實際分析上”^①。

但是在馬克思看來，重要的和必要的，不是單純的數字，而是被揭發的它們的關係，不是單純的數字核算，而是社會經濟的關係。馬克思曾經預告過，也同樣地必須反對不考慮到各種單純事實的具體環境而以各種單純事實作比較的錯誤。馬克思批評在普魯士的刊物上以英法兩國國會中土地所有權的代表人數同普魯士等級會議中他們的代表權相比較時，即指出拿起“對於英、法和普魯士的各種不同的數字，沒有同存在於這些國家之中的各種關係作必要的對比”^②而來相比較，是沒有用處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七章——剩餘價值率——中，根據各種詳細的數字的計算，簡明地述說他所發現的剩餘價值率的法則，他說：“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例，猶之於剩餘勞動對必要勞動的比例，或者就是剩餘價值率 $\frac{m}{v} = \frac{\text{剩餘勞動}}{\text{必要勞動}}$ 。”馬克思從這裏作出了天才的結論，他說：“……剩餘價值率是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或資本公司對工人的剝削程度的準確表現”^③。馬克思於是就用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統計資料來說明這個結論。

馬克思曾詳盡無遺地引用一個有一萬個精紡錘的紡織工廠的資料。這工廠用美國棉，紡三十二號紗，每星期每個紡錘可以出產一磅紗。馬克思在說明一切的計算後，就斷言：“由此看來，不變價值部分每星期合計是 378 鎊。工資每星期是 52 鎊。棉紗價格每磅 $12\frac{1}{4}$ 便士，一萬磅棉紗共值 510 鎊。因此，剩餘價值就是：510 鎊 - 430 鎊 = 80 鎊。我們可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第二八四頁。——譯文稍有更動——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九頁。

③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二四三頁。——譯文稍有更動——譯者。